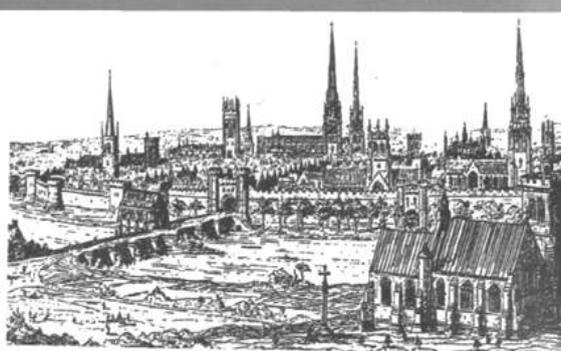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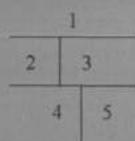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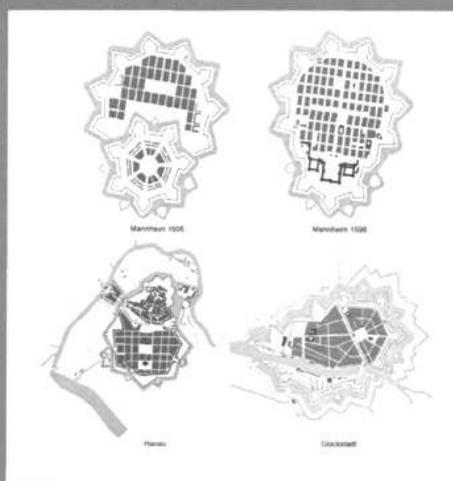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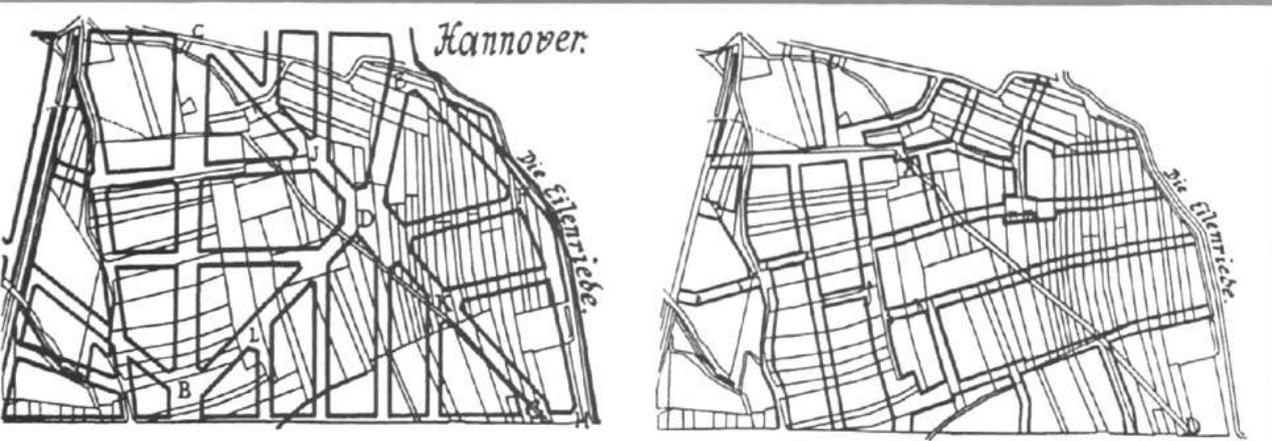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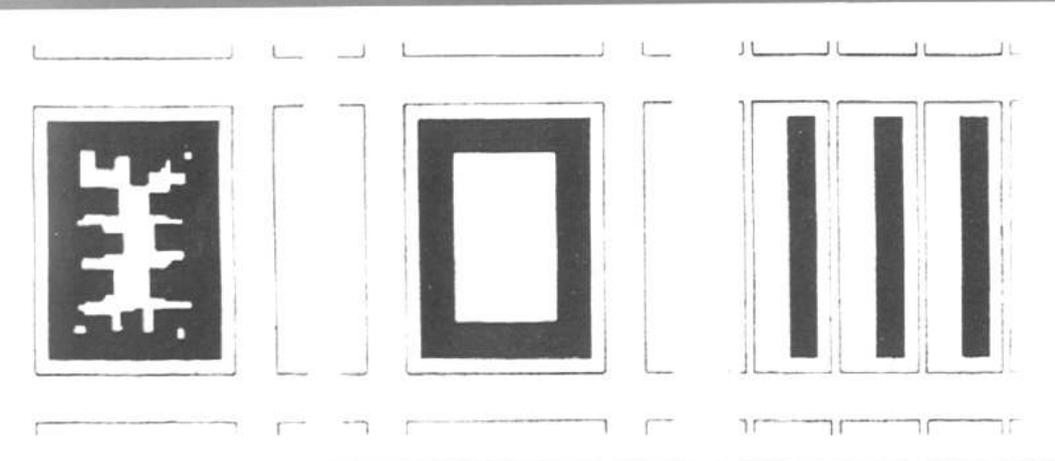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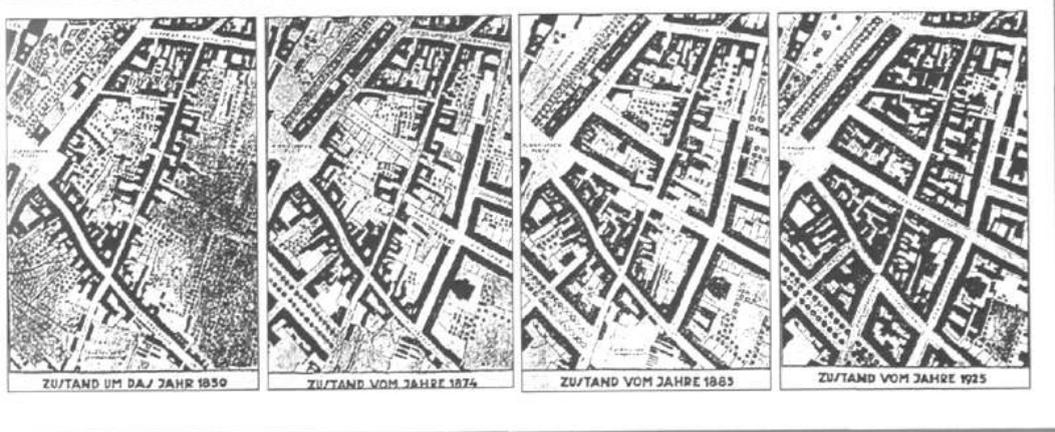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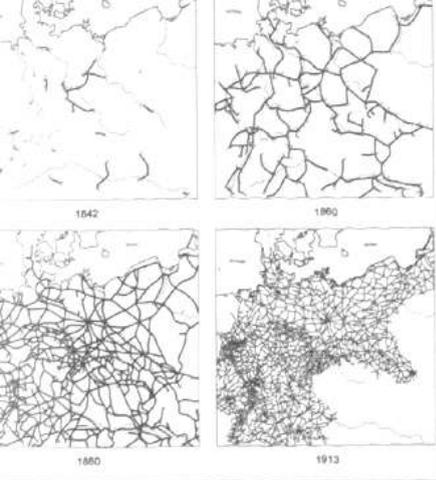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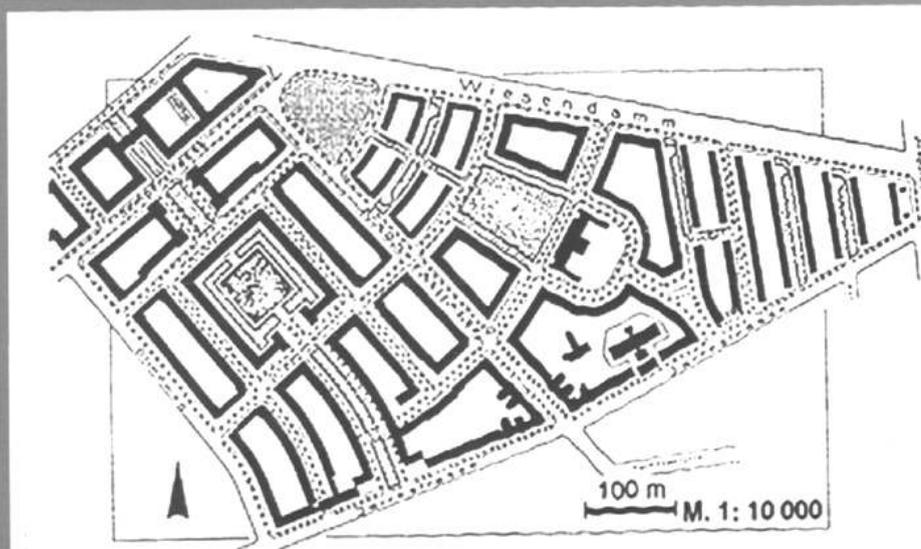
德国城市空间秩序的理性主义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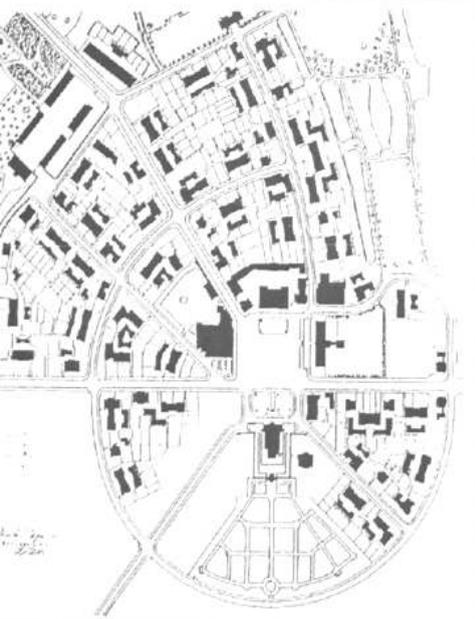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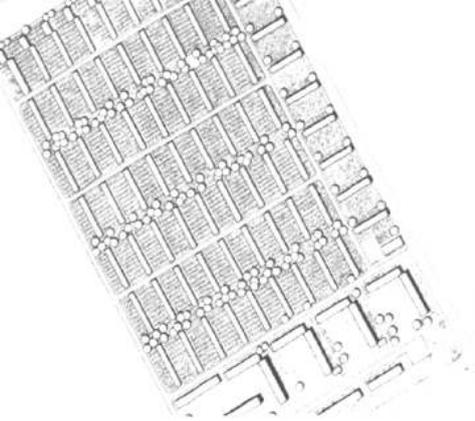
(文见第 47 页)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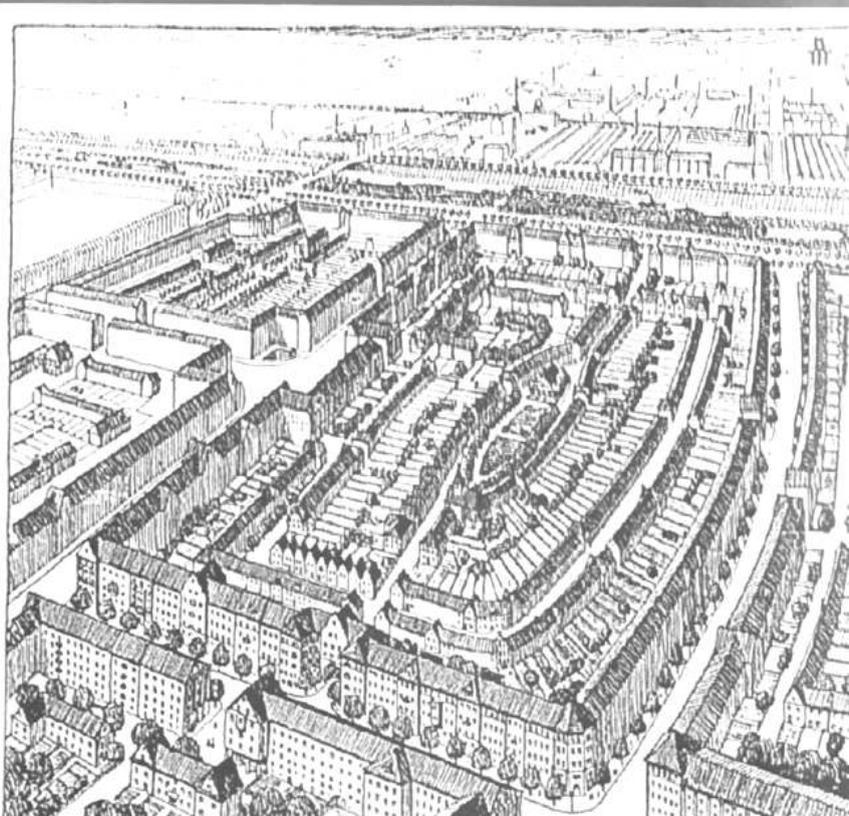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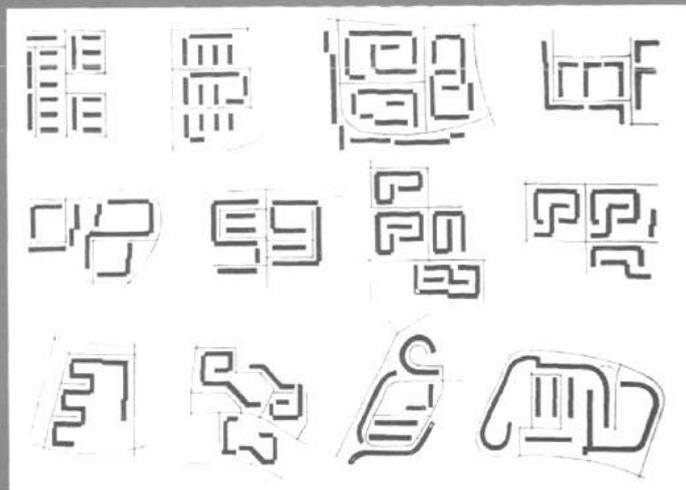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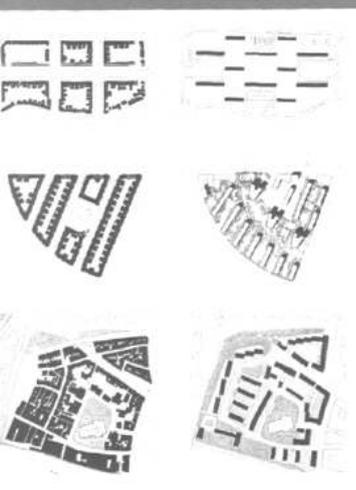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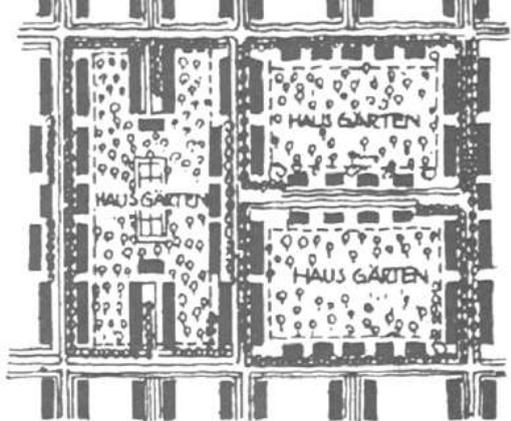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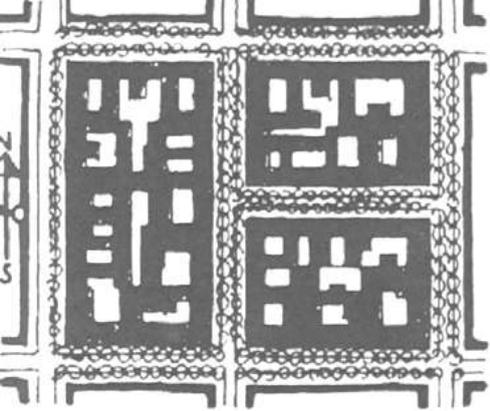


万方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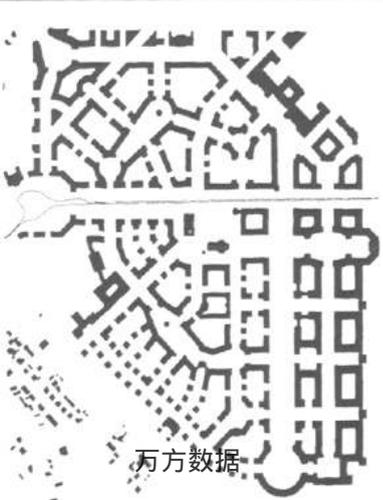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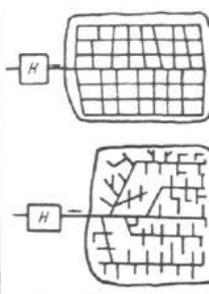


11	12
13	14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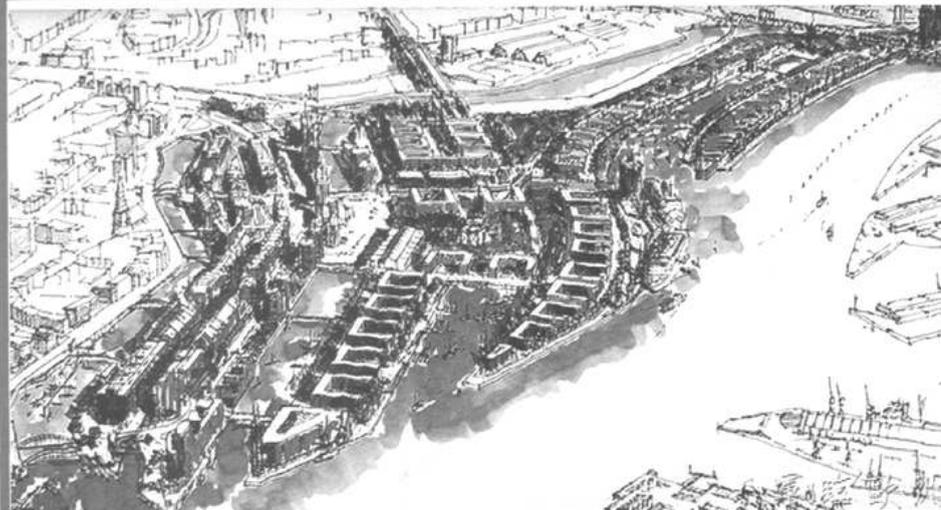




16	
17	18
	19
20	21



万方数据



德国城市空间秩序的理性主义之变

The Rationalism Evolution Process of Urban Space Orders in German Cities

杨猛 YANG Meng

摘要: 本文以德国城市空间秩序的演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从“自发的城市”到“设计的城市”、从拥挤的工业城市到“反城市”的田园城市、再从传统德国城市秩序到现代主义城市新秩序的城市实践历程,并指出德国城市空间秩序的转变伴随着对理性主义的不断追求和建设、反思与回归的交替更替,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城市。

关键词: 德国, 城市空间, 空间秩序, 演变, 理性主义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ce orders in German cit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ationalism evolution process of urban space, from “Spontaneous City” to “Designed City”, from crowded industrial cities to Garden City which is anti-urban, and from the traditional order to the new modernism urban order. The history of German urban space is accompanied with the pursuit and reflection for different rationalism urban order, a research on which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oday's Chinese cities more deeply.

Keywords: Germany, Urban Space, Spatial Order, Evolution, Rationalism

前言：“圆粉笔”和“方粉笔”

中国学校里的粉笔大多是圆形截面的,德国学校里的粉笔却大多是方形截面的。

圆形截面的粉笔虽然写起字来很舒服,但用完后必须小心地放到稳妥的地方或用粉笔擦挡住,否则一不小心它就会滚落到地上,摔成两半;方形截面的粉笔则大可不必有此担心,用过后续便一放,它便规规矩矩地躺好了——不过对于习惯了圆形粉笔的中国留学生,方方的粉笔用起来可是相当的别扭。

这个发现迅速成为中国留学生们餐桌上调侃德国人的话题——性格方正、呆板、有棱有角的德国人,连做出的粉笔都是方方的!“圆粉笔”和“方粉笔”虽然只是生活中最细微的设计差异,却也反映出中国与德国的不同文化与民族习性。刻板、理性的德国民族执着地追求“秩序”,这一方面表现为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但凡与德国人打过交道者大多对其严谨有着深切的感受,因为严谨,德国人行事上精确准时,思想上追求独立自由,研究上则要求深入基础、逻辑严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德国人对法纪的严格遵守,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秩序的强调和尊重,这深刻影响到德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从排队、过街等生活细节到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井然有序。德意志民族这种对“秩序”的执着追求同样映射在了设计的各个层面,从最小的设计——粉笔,到最大的设计——城市。

与法国或英国等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德国的权力和决策过程非常分散,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仅以城市规划领域为例,德国人和法国人对“秩序”的追求就走上了

作者单位: 杨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德国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研究院联合培养硕士

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法国城市多追求“对称”与“轴线”式的城市景观，其所向往的是建立在权力美学和君权至上基础上的“理想秩序”；德国城市所寻求的则是以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一种“理性秩序”。

卡米洛赛特(Camillo Sitte)使用过的一张图片可以很好地阐释这种法国式“理想秩序”与德国式“理性秩序”的不同(图1)，而笔者也认为这张图片是理解德国城市的最好的起点，因为它通过城市建设的一些细节回答了为什么今天的德国城市会具有如此面貌。在这张图上，法国人创造了充满气势的“林荫大道+对角轴线”的法国式“秩序”；德国人则创造了充满乐趣的“自由网格”的德国式“秩序”。在土地权属情况十分复杂的城市建成区，法国式的布局为了造就轴线、对称和林荫道而将既有土地划分成十分凌乱的碎片；德国式的布局则尊重了原土地拥有者的利益，以实用性为出发点，其结果是理性的城市空间秩序。法国式布局拥有了恢宏的纪念性城市空间，但大而空的城市轴线同时也带来了枯燥乏味的街道景观和生活；德国式布局中变形的网格则更加复杂和多样，与灵活多变的街道相伴而生的是丰富而又宜人的城市空间。两种不同布局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城市空间秩序，其间差异的形成虽然有着深远的历史与政治原因，但也直观地阐释了德国城市建设的传统——一种对实用、理性的城市空间秩序的追求。

与方方的粉笔一样，德国城市建设中对实用、理性的城市空间秩序的追求历程也是一个很“德国”的故事。纵观德国城市建设的历史可以发现三次从追求“秩序”到反思“秩序”的轮回：从最初“理性设计的城市”到城市卫生运动和田园城市运动，再到包豪斯和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德国城市建设追求着不同的实用和理性的秩序。本文以下将以时间为轴对德国城市“秩序”的演变进行梳理和分析，与此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反观自身，为更深刻地理解今日中国城市对空间秩序的追求和建立提供角度和思路。

一. 从“自发的城市”到“设计的城市”

德国得到良好保护的中世纪城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观光旅游，使人们在今天仍有机会感受到千年之前的城市文明与生活。虽然欧洲的中世纪是一段动荡、割据、生活贫乏的历史，但大部分的德国城市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在中世纪

后期的仅400年间，德国便有2500座“城市”宣告自治，今天主要的德国城市大都可以在当时的地图上找到。中世纪早期的德国城市大多围绕封建领主的城堡、修道院和富饶的农场缓慢地生长，城市一般规模都很小，一个“城市”的人口仅有100-2000人。随着商业与贸易的不断发展，长距离的商贸活动越来越需要城市为其提供受保护的市场和稳定的库存地、交易地，这导致了城市的发展和新的城市阶层——商人的诞生。中世纪德国城市的发展演变史也是封建领主、基督教派、商业及手工业者和普通市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其间从最初的相互依存到对话和斗争，种种社会关系的变更同样反映了在中世纪德国城市的空间关系里。

构成中世纪德国城镇的最基本“秩序”是由教堂、城堡、市场、市政厅和城墙五个基本要素共同组织成的城市结构，它们分别象征着基督教派、封建领主、商业和手工业者、城市自治和市民的权利。其中教堂是城市空间结构的中心，也是城市道路网的放射中心，象征着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在中世纪的德国，教堂是一个城市荣耀的来源，城市竞相把自己的教堂建设得更加雄伟、宏大，作为其引以为自豪的力量象征。市政厅和市场同样是构成城市的基本要素，也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城墙对于中世纪的城市则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具有防御的功能，更标志着城市自治和市民的权利，城墙之内是自由的城市公民，有着受到保护的市民权和交易权，城墙之外则是属于封建领主所有的奴隶和农奴。城堡通常建于高地之上，是大部分中世纪德国城市的起源，在今天名字中以堡(-burg)结尾的德国城市，如汉堡、沃尔夫斯堡、马格德堡等，大多便因为源自于封建领主的城堡而获名。

除了由以上五个要素所构成的基本秩序外，德国中世纪城镇空间便完全采用自发和随意的布局了，自由曲折的道路、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各异的广场……所造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中世纪德国“自发的城市”最典型的特征和最吸引人的空间体验。但这种貌似灵活多变、缺乏秩序的城市空间中却隐含着明确的结构关系，事实上，中世纪的德国城市并不是完全“自然生长”而来的，其自由平面的城市空间体现了一种“秩序中的自由”，是“秩序”的结构与“自发”的形态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自下而上的中世纪德国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及其带来的丰富的城市空间体验之

后更不断被用来与充满“秩序”的现代主义城市及其附带的冰冷、机械、缺乏活力的城市景象进行对比，成为了德国城市建设历史中不断反思所借鉴的原型。城市建设应该像中世纪那样，只控制基本的空间结构和秩序，具体的城市空间则留给业主进行自由的创造，这才是能够产生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空间生产方法（图2）。

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传播，采用规则、理性的几何图形的城市平面布局方式也影响到了德国，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种棋盘式或放射状的平面被重新应用于城市设计，“设计的城市”开始在德国出现。然而当时德国仅有极少数城市在规划中使用了理性平面，即Mannheim、Hanau和Glückstadt。Mannheim的1606年规划由南部放射状的军事营地和北部棋盘状的城市共同组成，随着1698年军事营地被毁，南部和北部的路网被联系在一起，城市最终被建设成了完全规整的棋盘平面。Hanau是格林兄弟的故乡，城市由不规则平面的老城和规则平面的新城组成，两条主要的街道串起了老城自由灵活的道路网，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新区规整的平面布局。Glückstadt是德国北部城市，由于当时汉堡、吕贝克地区激烈的商业竞争，城市不得不加强防御能力，因此在新区建设中，封建领主采用了当时被认为具有最好防御效果的正六边形平面形式；城市西部仍保留了较为自由的布局，东部新城则采取完全几何形态的放射状路网；由于放射状平面在Mannheim并未实现，因而Glückstadt成为德国最早也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采用放射状平面布局的城市（图3）。

从中世纪自发“生长”的传统城镇空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为“规划”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寻求“秩序”的过程中，几何的理性秩序替代了原有的自然有机秩序，笔直的道路和规整的广场在消灭传统城市空间的同时也消灭了城市生活与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文艺复兴城市的几何状道路网中，几乎完全找不到传统城镇里那样的街道转角或建筑边界处令人惊喜的公共空间，几何形态的广场也不像中世纪城市里平面奇怪、大小各异的公共广场那样充满活力，往往大而空旷，界面冰冷生硬（图4）。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过程，因为从中世纪城镇到文艺复兴城市的变化并不是像现代主义运动一样的建造方式上的彻底革命，传统的建造技术完完全全地得到了保留，城市中的建筑仍然

是非常地道的传统住宅，建筑的形式、色彩、材质、装饰等都有着丰富的变化和细节，街道两边的建筑界面也因此保持着一定的多样性，但整体城市空间却依然缺乏活力，缺少那种传统城镇应有的“感觉”。

这种落差恰恰深刻地反映了建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城市空间的不仅仅是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建筑围合形成的空间；仅仅通过建筑设计的多样性无法实现城市空间的丰富和多变，这正是许多以此为途径及目标的开发项目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德国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大多数城市拆除了限制城市发展的中世纪城墙，修建成环绕城市的绿化带或高速交通环路，并大刀阔斧地规划城市的扩展新区，满足迅速涌入城市的工业人口的住房需求，雄心勃勃地建设属于工业时代的大都市（图5）。在这个过程中，对德国城市影响最大的“新秩序”就是铁路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发展。德国城市的发展幸运地选择了铁路和轨道交通，其所导向的城市发展和汽车导向的城市发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必然地导致了集中的城市空间，后者则必然地导致了分散的城市空间。

德国城市一直将火车作为便捷舒适的长途交通工具，更把市内轨道交通、郊区地铁和城际高速铁路车联结成了一个完备的轨道交通系统，这个系统正是德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让城市可以保持较小的尺度，但又能方便地获得大城市的生活和服务。在欧洲，通过轨道交通系统的无缝连接，从一个城市到达另一个城市成为一件很轻松惬意的事情，而针对学生、老人的各种出行福利也有效增强了市民的出行能力，降低了小汽车的使用率。

十九世纪是德国铁路交通网络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城市空间集中建设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前的德国城市规模十分有限，城市景观以田园风光为主，正是由于铁路交通网络将一个个城市联系起来，才使德国城市开始了真正的集中化发展，建筑高度、城市密度和城市周边的新区数量及规模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图6）。火车站大多修建在原先城墙的位置，也就是老城的边缘，但由于德国老城一般都很小，因此新的火车站与旧的城市中心之间多半是可以接受的“步行距离”，这种适当的距离使乘坐火车变得非常方便，也使火车在之后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

城市空间发展新的主导。

连接老城和新火车站的城市主要道路和规划的新区是十九世纪德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区域,大多数德国城市现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并没有选择老城传统的市场或广场,而是沿着老城—火车站的轴线慢慢生长成形的。在许多德国城市,传统的老城中心仍保留着历史的面貌,各种售卖摊位、花市、鱼市等都充满了德国传统风味,市场与广场周边也大多是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和咖啡厅、小酒馆等休闲娱乐产业。传统风貌的保留使老城中心成为了城市营销的亮点和吸引旅游者的所在,真正的现代商业中心则大多是通往火车站的商业主街,如斯图加特的国王大街、汉诺威的火车站大街等就是非常著名的城市商业街。在汉诺威,人们一眼就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传统城市与新火车站放射状城市新区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空间秩序(图7)。随着二十世纪德国火车站的综合改造,火车站本身更是成为了城市中的生活消费综合体和发展新中心,火车站区域则成为与城市中心、教堂、市场等同样重要的空间“要素”,也是城市主要的公共空间。

二、“反城市”的德国城市空间新“秩序”

德国的城市建设思想一直都是反对城市化的,从中世纪传统城镇、魏玛共和国时期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一不是如此,而希特勒本人更是反对城市、倡导乡村生活的代表。在德国城市发展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却一直贯穿着反对城市化的“秩序”,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具有戏剧性的现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年,德国的城市发展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中,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于城市发展问题的强烈冲突上。对于地方政府,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大批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使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原先那些优雅和充满贵族气质的城市空间被贫民窟和冒着浓烟的工厂所破坏,浪漫的城市街道上混杂着大量衣着褴褛的进城工人。在那个时期,工业化就如同破坏传统城市的病毒一样,工厂建在哪里,哪里就立刻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城市街区内部的建筑密度迅速提高,环境和卫生状况随即恶化。工业化带来了城市的发展,却使地方政府面临着尽快解决大量工业人口的住房需求、进行城市给排水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以及改善空气、光照质量等城市卫生条件……等等一系列紧迫问

题(图8)。

但对于中央政府——那时的德国还是“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根本不关心城市中普通平民的生活需求,城市规划只不过是权贵阶层手中的“玩具”,只要城市的发展没有危及国王和贵族的利益,他们就懒得作出改变。即便是之后兴起的城市卫生运动,从根本上也并非缘于贵族想要改善城市平民生活境况的慈悲心肠或平民阶层的不断诉求,而是因为城市卫生状况的不断恶化导致从城市招募的新兵数量大大减少,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了统治者的安全,致使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市卫生运动,以期改善城市平民的卫生和健康状况,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尽管存在这样的矛盾,但在一战前的德国,无论地方政府抑或中央政府都是坚定的反对城市化主义者。就中央政府而言,城市化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威廉二世的政府首先强调的便是保守的政治立场和维持社会现状的希望,而城市无疑代表了新兴的文化,是激进的、反对帝国和君权统治的新势力的集中地,也是无产阶级的中心和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温床;地方政府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城市”是拥挤、贫民窟、卫生状况恶劣的代名词,“邪恶”的工业发展推动的城市化产生了“邪恶”的贫民窟,进而使城市变得腐坏,使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低下。实际上,对于城市文化的反感普遍存在于当时的西方世界,而同期产生的伟大城市思想——田园城市、广亩城市、光明城市等等,其主旨无一不是消除城市的“邪恶”,逃离拥挤的城市环境,回归自然和充满阳光的优雅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战前德国的城市发展思想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形成了广泛存在的逃避城市现实发展的思潮,他们一边对工业化的罪恶及其带来的恶劣的城市卫生状况进行抨击,一边主张回归田园的生活。这些学者中有的支持乌托邦的低密度定居点,有的主张将城市人口的居住放到农村和郊区的“工厂社区”中去,甚至还有学者倡议人们回归于中世纪城堡和低层居住建筑中的生活。另一派学者则受到豪斯曼巴黎改造成果的鼓舞,他们坚持认为城市的问题应该从城市内部来解决,而不应该逃避或将其抛给农村。他们主张通过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降低城市密度、加强空气流通、提供城市公园、街头绿地及基础设施……等措施来拯救城市,像豪斯曼那样对城市进行外科手术。但不论是哪一派的观

点,降低城市居住密度、改善城市卫生状况都是一种共识。

反城市化的思潮迅速转化为一种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新的功能性“秩序”,德国传统的自由变形网格的空间“秩序”被规则的城市平面、宽阔的道路和密度越来越低的城市建筑所取代。这种为了“功能性改善”而建立的“实用性”新秩序为城市带来了更充足的阳光和更多的新鲜空气,但也使城市的风貌和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传统的浪漫、自由的平面和“街墙”式建筑渐渐消失,转而出现的是规则正交的城市平面和行列式排布的城市建筑(图9)。

新的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秩序带来了德国城市街区建设方式的巨大改变,“街墙”的变化就是其典型表现之一。作为德国传统的街区建设方式,“街墙”围合了最具德国风味的公共空间和街道景观,但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街区内部的建设总是无法控制,导致城市环境不断变坏,因而新的秩序首先便对街区内部进行了控制,具体做法是通过整体开发形成巨大的庭院,从而保证建筑的间距和通风,杜绝街区内部的超密度建设。汉堡市的Jarrestadt正是反映这个过程的典型案例(图10)。

但围合式的“街墙”建筑始终不是解决通风和采光问题的最佳方案,于是出于功能性的需求,行列式建筑将其取而代之。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建成于20世纪初期的法兰克福Westhausen社区,其彻底与德国的城市建设传统决裂,以舒缓的建筑间距、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环境共同形成了吸引人们逃离拥挤、狭小的城市中心区的主要动力。新秩序成为了健康城市生活的代名词,取得了功能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但也失去了传统的德国城市空间格局和其间蕴含的美学价值(图11)。

德国城市建设对“秩序”的追求总是处于探索与反思不断循环的过程之中,针对“功能主义新秩序”的批判的领军人物正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卡米洛塞特。塞特经历过众多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和公共空间,因此十分担心城市化仅仅成为一个技术的过程而没有任何美学或精神上的进步;他反对仅从实用和卫生角度出发进行的城市设计,认为出于经济因素且缺乏美学价值的空间新秩序正使城市变得越来越缺乏趣味。塞特重新强调了传统城市美学的重要性,指出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来自一种传统的美学方式;在形态上则

强烈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规则平面和正交道路网,认为变化的道路网格是创造城市空间乐趣的关键。塞特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规划师,虽然紧随其后的德国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完全抛弃和背离了他的想法,但当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衰落后,塞特的理论又在城市建设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其作品也经常被引用作为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批判。

田园城市运动同样对德国反城市化的新秩序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德国反城市化的文化传统,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一经传入德国,便迅速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德国的许多城市成为了田园城市运动积极的实践者。然而,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运动更注重社会的改良和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德国的田园城市运动则更多地反映出当时德国大众的一种理想居住情结。“从工业堕落的城市,从远离家庭和精神空虚的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回到农场,回归家庭生活”,这是当时德国主流社会阶层向往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田园式的生活理想——园艺、种植、和家人共度花园里的周末……一直深深影响着德国人的城市生活,直至今日(图12)。

德国的许多城市于20世纪初都在郊区兴建了所谓的“田园城市”,虽然有着学校、幼儿园和少量公共建筑,但这些“田园城市”实际上仅仅是城市周边新的低密度居住区而已。Marge是德国的第一个田园城市,在逃离城市、追求田园生活理想的同时,Marge的平面布局同样抛弃了德国的城市传统。仔细观察Marge的平面会发现其设计非常奇怪,既不是街墙式,也不是行列式,而是使用了一种类似“雷德朋”的人车分流系统。在Marge,道路界定了车行流线,而在地块内部,建筑布局则界定了复杂的步行系统,就如同在传统的德国城市中,“街墙”界定出街道空间一样(图13)。

关于田园城市,之后在德国发生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田园”与“城市”的结合。虽然德国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并不比美国人对郊区生活的热情小,但“田园”在德国城市中的发展始终是紧凑的,而没有无限地蔓延。1920年柏林某居住区的设计方案可以说是对德国人的田园热情极好的诠释,其中沿主要城市道路的街区仍按照传统德国“街墙”的方式建造,以多层集合住宅保证柏林大都市的整体空间形象;街区之内则以低层、低密度的田园住宅、绿化和庭院来实现田园

生活的环境与情调(图14)。在这里出现的一个戏剧性差异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描述的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新型城市,德国柏林的这个居住区却俨然成为了“城市”之中的“乡村”。

本时期的另一场不得不提的巨变发生在从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后的德国城市建设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共和国”取代了“帝国”,德国社会关系的转变可谓翻天覆地,社会的主人和城市建设的目标和战前相比都大大不同了。如果说在帝国时期,城市规划只是权贵阶层手中的“玩具”,那么在共和国时期,其已迅速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城市建设的首要目标乃是为公民提供舒适的城市空间和卫生的城市环境,而不再是为权贵阶层和国家统治者的享乐服务。由此,城市住房的建设、发展和改善成为了有计划且目标明确的工作,城市规划理论界也将目光迅速转向了人民的具体生活需要,开始关注大量普通城市居民的居住、工作和娱乐需求,并着力于提供百姓能够承担的技术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实用性、标准化和功能主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新的社会文化和标准应运而生。该时期的德国城市建设理论异常激进,包豪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

三. 德国现代主义城市秩序的探索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德国城市建设史中无疑书写了举足轻重的一笔,但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因为其中涉及到了太多的建筑理论和思想,也已经有太多的学者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在此仅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城市空间“秩序”放置到20世纪的德国城市中,作出相应的考察和分析。

现代主义建筑通过技术的手段突破了装饰和风格的桎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德国施展拳脚的主要空间还集中在城市边缘和新开发的城市拓展区,其主要任务也不过是用低成本的新技术解决各种类别的工人居住社区及大量城市住宅的需求问题。尽管包豪斯领先的设计思想得到了德国各界的广泛称赞,数以千计的现代居住单位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科隆等城市中修建起来,但现代主义运动依然徘徊在城市的边缘,而真正的城市生活中心——那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及其围合成的公共空间——却依然保持着过往的“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现代主义建筑运

动并没有真正改变德国城市的面貌。

但这种状况随着二战的爆发而终结了。在战争中,盟军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疯狂的轰炸,许多城市一半以上的面积完全成为了废墟,原先珍贵的历史建筑——市政厅、剧院、图书馆等大量被毁坏。受到毁灭性破坏的不仅是实体的建筑,还有德国城市的传统“秩序”和文化。然而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来说,战争却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施展拳脚的机会,旧的秩序已经消失,新的秩序亟待建立,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城市的重建显示出比40年代更加激进的态势。战争的破坏也给了德国城市一次“重新出牌”的机会,使德国人可以按照心中的理想图景来建设城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德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兴高采烈建立起来的“理想秩序”,如今却已成为建筑师和规划师们头痛和反思的对象了(图15)。

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沉浸在创造新秩序的期盼与激情中,他们普遍将重建的机会上升到了社会改良的历史高度上,并对19世纪的城市传统秩序充满了不屑。在大规模重建展开之前,首先进行的是对过去城市问题的一场广泛的讨论和批判。人们普遍认为,原先的德国城市过于拥挤,街区内部的建筑密不透风,许多房间一年到头都照射不到阳光,垃圾和污水更成为城市公共环境维护中的难题。这场广泛的批判迅速将解决问题的途径归结为两点:更低的建筑密度和更宽的马路,前者有利于城市的采光、通风和卫生、舒适的城市环境的创造,宽阔、笔直的马路和流畅的交叉口则被认为是改善城市交通的有效方式(图16、17)。

因此,在接下来的大规模重建中,现代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城市图景。但可惜的是,那个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实在太过激进了,他们鄙视并抛弃了一切传统的空间和秩序,希望建立完美且全新的“新秩序”,于是城市空间秩序被矫枉过正了(图18)。不难发现,在德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城市拓展的速度和“新秩序”激进的程度总是相对应的,而越是激进的新秩序,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就越多。在战后快速的大规模重建中,德国城市传统的空间秩序被极大程度地改变,而这些按照现代主义“新秩序”建设起来的德国城市,在今天看来大多是冰冷、枯燥而缺乏活力的。中国城市如今的建设速度也很快,就像是德国战后重建一样危险,但这种危险性并不来源于过度的激进,而是由于某种缺乏深刻思考和文化甄别的拿来主义。

德国对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秩序”的追求不仅表现为关于图纸上建筑布局的“洁癖”，即对平面形态中序列感的注重，更表现为对从功能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结构的热衷，并因此以“树形”的城市空间新秩序取代了传统城市空间的网络状秩序（图19）。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给传统德国城市带来的改变既关乎建筑的风格与形式，也涉及到了整个城市系统，例如城市的交通体系。像美国的雷德朋系统一样，德国城市同样将“人车分流”和“尽端式道路”作为提高交通效率与形成安全社区环境的有效方法，树形空间新秩序的出发点就是将城市像机器一样分析和解剖，从效率和功能的角度出发去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尽管人车分流与尽端式道路在局部区域内实现了高效、顺畅的交通流线和安静的居住环境，但却把居住社区从整体的城市环境中剥离了出来，而内部独立的交通系统也大大增加了外围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从传统的“网络”结构到功能性的“树形”结构，前者开放且蕴含着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后者在使城市像机器一样高效运转的同时却导致了空间的单调和乏味。现代主义对城市的“秩序”进行了功能性和技术性的改良，但却忽略了城市生活的本质和人的体验，其后果是由汽车主导的城市空间逐渐取代了充满街道生活丰富细节的传统城市空间。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开始批判现代主义新秩序所导致的城市空间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倾向，认为这是片面重视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而忽略人的精神需求所造成的结果。五、六十年代兴建的现代主义城市住宅，如今多已成为了移民和低收入阶层的居所。80年代以后，德国城市越来越多地投入了对城市空间秩序的反思与回归，传统的德国城市空间秩序重新受到了重视，沿街区边界连续修建房屋并通过“街墙”围合街道与广场空间的传统建设方式与现代主义的技术和理念最终走到了一起（图20、21）。传统的城市文脉、多样的街道活动、混合的土地利用如今都成为了德国城市开发建设的主流，城市空间秩序从追求实用和功能的现代主义秩序又一次回归于注重人文精神的传统秩序，完成了德国城市空间秩序新的循环。

（本文图片见彩页第36-39页）

图片说明：

图1：卡米洛塞特（Camillo Sitte）比较了以

林荫大道+对角轴线为主要特征的法国式“秩序”（左）和具有灵活变形网格的德国式“秩序”（右），指出基于实用和理性主义的“秩序”是德国式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出发点。

图2：中世纪的德国城市，自由的平面之中蕴含着统一的秩序，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其具有令人着迷和赞叹的魅力。

图3：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仅有的几个按照理性平面建设的城市，其与中世纪自然生长的传统城镇无论在平面布局还是城市空间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图4：德国不来梅著名的“Schnoor”区（上）和Glückstadt几条放射状道路中的一条（下）。前者是典型的中世纪自由生长的城市空间，丰富多变的街道、街两侧和转角处的精美店铺以及细腻的开放空间使“Schnoor”区让每个来到不来梅的游人难以忘怀；而Glückstadt的这条人为规划的笔直宽阔的街道虽然同样拥有两侧丰富的建筑，但其界定的整体城市空间似乎却始终缺乏足够的趣味性和令人忍不住想要探索下去的吸引力。

图5：德国某滨河城市从1440-1840年的巨大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为城市建筑由低层变为多层，并且变得更加坚固，更暗示了城市空间“秩序”的显著改变。在传统的中世纪城市里，人们总是竟相把自己房子的塔楼修建得更加高大，因为建筑轮廓线在城市平坦的天际线中越高、越挺拔、越突出，便说明房屋主人的地位越高，而那时城市中最高的建筑通常是教堂的钟塔（上）。但这种状况在400年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城市中耸立的不再是高高的尖塔，而是一根根冒着浓烟的烟囱。新的城市阶级取代了封建贵族，开始主宰城市，城市成为了工业生产的巨大厂房，工业的发展也使城市的传统空间和景观一步步改头换面：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被拆除，道路与桥梁变得更加宽阔、结实和坚固……（下）

图6：德国的铁路交通网络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获得了迅猛发展，新建铁路线路不仅在大城市之间建立了联系，也使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再疏远。

图7：左图为汉诺威的城市模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近处的放射状火车站新区和远处的老城两种完全不同的“秩序”拼合在一起，连接火车站和老城的林荫大道则是城市现代商业发展的主要轴线。右图中Braunschweig新建的火车线路并没有以传统的方式切过城市边缘，而是采用了尽

端火车终点站的形式,这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赞扬,被认为是既拉近火车站与城市中心之间的距离、又避免铁路轨道对城市发展造成影响的有效方法。

图8:德累斯顿的一个区域从1850年到1925年的迅速变化。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那个时代涌入城市的大量工业人口对城市造成的巨大影响:街区的建筑密度迅速提高,1850年的城市边缘区到1925年已变成了过度建设的拥挤的城区。

图9:格罗皮乌斯绘制的城市街区演变图,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卫生运动和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思想对德国城市空间秩序的改变。其中中图所示街区大多是为了形成有效控制而整体开发建成的,因此缺乏左图所示小地块私人开发产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从中图到右图,建筑虽然获得了更好的通风和采光条件,却完全抛弃了德国城市的空间传统。

图10:Jarrestadt。作为一个整体开发的项目,虽然从平面上看其仍然具有传统的德国城市空间秩序,但统一的建筑形式使这个地区的城市景观显得单调乏味。

图11:法兰克福的Westhausen社区。从平面上看,它和德国城市的传统空间秩序格格不入。

图12:田园式的生活理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德国人的城市生活。

图13:德国的第一个田园城市 Marge。从图中可以看到其建筑布局非常奇怪,既缺少规律也没有什么平面美感。建筑围合出了非常复杂的邻里公共空间体系,街道空间则环绕在住户的花园中。

图14:德国人对“城市”与“乡村”的结合既可以表述为街区外围与中心的“两层皮”现象,也可以说是在城市中追求乡村生活梦想的掩耳盗铃式规划。这种德国人发明的“乡村化城市”的设计方法曾在19世纪影响过许多欧洲城市。

图15:柏林Karl-Marx-Allee区域在1940年、1953年和1989年的建设状况。图片清晰地反映了城市尺度的巨大改变和从过于密集转向过于稀疏的城市建设密度,从中可以看出新的建设方式所导向的城市空间与德国传统城市空间在尺度、密度等方面的极大差异。

图16:二战前德国城市街区的建筑密度非常高,采光、通风条件十分恶劣,这在当时的欧洲是普遍存在的状况。但不同于其它大部分欧洲国家针对过度的街区建设从街区内部一点点清理

“违章建筑”的漫长过程,由于二战中盟军的轰炸直接抹平了德国过度建设的城区,所以德国人面临的问题只是如何快速建设其心目中“理想的”“低密度”而又“卫生”的城市。

图17:汉堡的两个城市建设区和不来梅某区域在战前与战后的对比。

图18:在现代主义建筑用行列式布局取代了传统的“街墙”式城市建设之后,面对大量关于空间乏味的质疑,新建住区也进行了自我改良,于是行列式转换成了各种扭曲的建筑布局和奇怪的空间围合方式。

图19:传统城市空间的网络状秩序与从功能和效率出发的树形城市空间新秩序。

图20:1990年在波兹坦市周边新开发的住区项目。该项目中的住宅多为5-7层的坡顶建筑,其一方面沿着街道作“街墙”式延展,另一方面围合出了公共与半公共空间,使道路和建筑的界面充满了有机的变化。这是对传统空间“秩序”的回归,也完美地阐释了19世纪初卡米洛塞特所坚信并推崇的传统城市美学。

图21:汉堡港口新城的开发。传统街区尺度和建设方式实现了与现代建筑的结合,传统城市空间秩序与新的建造技术最终走到了一起。

参考文献:

[1]Kiesow, Gottfried. Gesamtkunstwerk - die Stadt :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vom Mittelalter bis in die Gegenwart [M]. Dt. Stiftung Denkmalschutz, 1999

[2]Jonas, Die Stadt und ihr Grundriss : zu Form un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adt nach Entfestigung und Eisenbahnanschluss [M]. T ü bingen [u. a.]: Wasmuth, 2006

[3]Bohl, Charles C. Sitte, Hegemann and the Metropolis: modern civic art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M]. London [u. a.]:Routledge, 2009

收稿日期:2009-09-01